

「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 應成為北京城市性質的要件

沈金箴

香港亞太研究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應成為 北京城市性質的要件

沈金箴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作者簡介

沈金箴博士為北京市規劃委員會（首都規劃建設委員會辦公室）高級城市規劃師、國家註冊城市規劃師及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博士後。

鳴謝

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趙群毅博士和劉洋先生協助整理部分資料，謹此致謝。

© 沈金箴 2006

ISBN-10: 962-441-164-6

ISBN-13: 978-962-441-164-5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應成為 北京城市性質的要件

前言

對於經濟中心職能是否應作為要件進入北京的城市性質，自1993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實施以來，一直存在兩種觀點。一是以管理層為代表的反對意見。他們或者懷疑北京經濟中心職能的存在，或者擔心如果在城市性質中明確北京的經濟中心職能，將重蹈舊轍，影響北京作為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發揮。另一種是學術界的贊成觀點。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北京具有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的職能，如趙京興（1996）、楊開忠（1997）、胡兆量（1999）、顧朝林等（1999），更有學者明確提出應在城市性質中明確北京「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的職能，如周一星（1996, 1999）、周一星、陳彥光等（2003）、羅哲文（2004）等。但在學者們的論述中，對北京的經濟中心職能的分析大多聚焦於北京在過去和現在，對國內經濟的直接貢獻和作為全國經濟管理中心的作用。對北京未來能否以及如何鞏固和發展這種中心地位，北京具有的聯結世界經濟體系的功能（這是全球化下經濟中心的最高層次涵義），缺少必要的分析，無法使城市性質更準確地表達城市未來的發展方向。

有關的重要概念

城市職能與城市性質：城市職能是指城市在國家或區域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承擔的分工。其著眼點是城市的基本活動。城

市性質是城市主要職能的概括，指一個城市在國家或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代表了城市的個性、特點和發展方向（周一星，1999）。城市性質並不同於城市職能，確定城市性質一定要進行城市職能分析，既要避免把現有城市職能照搬到城市性質上，又要避免脫離現有職能，完全理想化地確定城市性質。可以說，城市性質是在歷史、現狀基礎上，對城市未來主要職能的一種趨勢判斷和展望。

經濟中心與世界城市：中心相對於一定區域而言。經濟中心作為區域經濟學的概念，有嚴格層次性（趙京興，1996）。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中心有三層內涵，一是自身具有一定經濟規模，並在區域產業鏈條中佔據高端位置，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二是以決策中心、管理中心的角色組織與指揮區域經濟發展；三是全球經濟體系的主要節點，全球經濟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區域聯結全球經濟體系的主要通道。後一層中心功能只有國家級以上的重要經濟中心才可能具備。世界城市首先是個經濟概念（沈金箴、周一星，2003），是主要的國際金融和商業服務中心，有強大影響的決策者的聚集地，重要的國際新聞和信息發散中心，領先的國際創造性文化產業中心，國際旅遊中心（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署，2005）。因此就目前及今後的發展趨勢而言，一國的重要經濟中心與世界城市在經濟規模、主要產業類型、經濟組織功能和國際化方面具有共性。

經批准實施的《北京城市空間發展戰略》（北京市規劃委員會，2003）提出，「世界城市」是北京的四大城市發展目標之一。¹ 世界城市屬於城市職能範疇（周一星、陳彥光等，2003）。因此北京城市性質的確定，可以也應該從世界城市的特徵尋找思路。世界城市一般具有較強的世界（或區域）經濟中心功能（Hall, 1982, 1998; Friedmann, 1986; Sassen, 1991; Short et al., 1996），² 那麼，北京的經濟中心職能（對中國而言）現在及今後是否存在，是具有什麼樣涵義的經濟中心，就成了確

定新時期北京城市性質、實現城市發展目標一個無法繞開的重要議題。

「經濟中心」作為要件從無到有，又從有到無

關於北京是否應成為中國的一個經濟中心的討論，由來已久，並反映在城市性質的不斷修改當中。事實上，北京的經濟職能及對它的認識正是在這種歷史的演進中不斷得到塑造和再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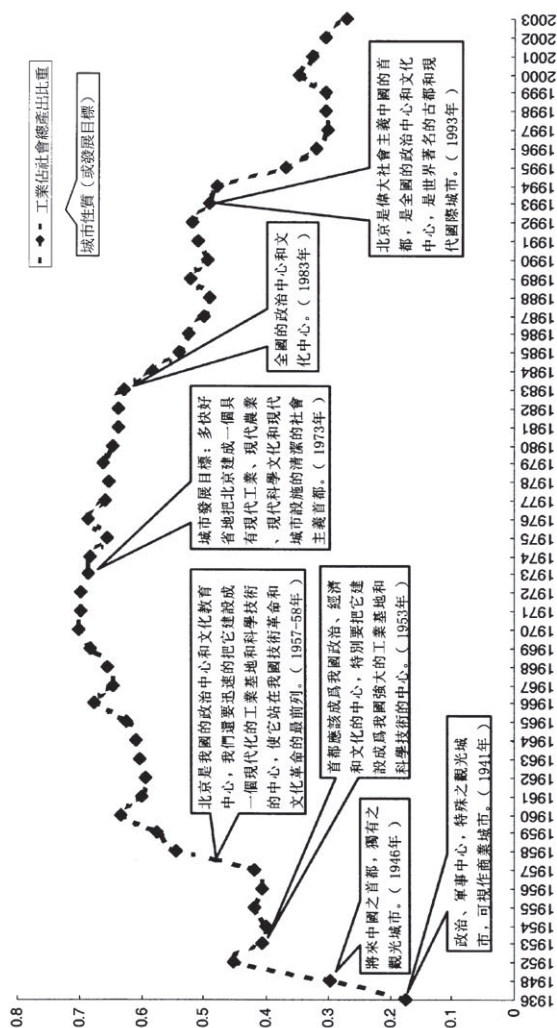
「經濟中心」的存留一直是討論城市性質的焦點

北京在秦、漢、隋、唐時期是北方軍事重鎮和交通樞紐，遼、金時期為行政中心，元、明、清時期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消費性經濟中心。此後，在歷次總體規劃中，「經濟中心」作為城市性質的要件從無到有，又從有到無（如圖1）。新中國成立後，在當時「變消費性城市為生產性城市」的指導思想下，強調要把北京建成中國的經濟中心，因此城市經濟中心職能不斷增強。為扭轉過去過於強調發展經濟職能所帶來的負面影響，1980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在關於首都建設方針的指示中指出，首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不一定要成為經濟中心，因此1983年版北京城市性質中就取消了「經濟中心」的提法。1993年版延續了這種意見。之後，如前所述，不斷有學者建議恢復「（重要）經濟中心」的表述。

「經濟中心 = （重）工業中心」是引發當前爭議的主因

在歷版北京城市性質中，強調經濟中心職能實質上就是強調工業中心職能。如圖1，1953年規劃提出北京應該成為「我國經濟中心」，並強調要建成我國強大的「工業基地」。1957-58年規劃則直接指明要建設成現代化的「工業基地」，1973年

圖 1：北京城市性質引導工業發展



注：歷年總體規劃為：1941年《北京都市計劃大綱》、1946年《北平都市計劃大綱》、1953年《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要點》、1957-58年《北京城市規劃初步方案》、1973年《北京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1983年《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1993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

資料來源：城市性質根據周一星等（2004:3-6）整理。工業佔社會總產出比重1952-1998年根據北京市統計局（1999）計算，1999-2003年根據北京市統計局（2000-2004）計算。

規劃則把發展「現代工業」列在了經濟發展的首位。從圖1還可看出，通過在城市總體規劃中對北京的性質定位，北京的工業職能呈現出與這種定位相一致的變化趨勢：1953年後，北京工業職能逐步增強，1960年形成小高潮，1970年代初期則達到頂峰。在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成為全國重要經濟中心的同時，北京的工業產值佔社會總產出比重都在50%以上。但隨著1980年中央關於北京「不一定要成為經濟中心」的指示的出台，和1983年、1993年城市性質中對經濟職能描述的取消，1980年後、1983年後和1993年後北京的工業職能呈三個梯次地削弱，1993年後最為明顯。這一方面表明以前「經濟中心」的內涵實質上就是「工業中心」，另一方面也表明城市的性質定位對引導城市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應重視城市性質的準確確定。

進一步講，當時強調經濟中心職能實質上更是強調重工業中心職能。1949至1978年，工業始終是北京生產性投資的主要對象，投資一直穩定在50%至70%，投資額總是遠高於工業基礎雄厚的天津，甚至超過上海，踞全國城市之首，工業總產值在這段時間內超過天津。同時，工業投資又向重工業高度傾斜。對重工業的投資一直佔全市工業總投資的70%以上。尤其是在1958至1978年，重工業獲得了大發展。在國家迅速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戰略的指導下，北京實行向重工業傾斜投資的政策。「大躍進」時期（1958-1960年），出現大上工業的高潮，建立了冶金、化工等基礎工業；「三五」、「四五」、「五五」三個五年計劃時期，以鋼為綱，重點發展冶金、石化、電力等原材料、燃料動力工業，先後上了首鋼850軋機、燕山石化等一批重工業項目。這20年，北京重工業佔全部工業投資比重達到90%。到1978年，北京工業總產值達到193.1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重工業佔65%（北京市統計局，1999），化工、冶金、機械產品在全國均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城市已發展成為具有相當規模、工業門類比較齊全、技術力量比較雄厚的全國重

工業基地。因此可以說，在這段時期，北京「經濟中心」更實質的內涵是「重工業中心」。

30年的重工業發展，使北京成為僅次於上海的中國第二大工業城市，成為一個集政治、文化和重工業經濟中心職能於一身的綜合性首都，同時也付出了不菲的環境代價，這個代價至今還在承受。更為重要的是，使北京的經濟職能在多數人的思想中逐漸地被固化為一個等式：經濟中心 = (重) 工業中心。以至於在後來當北京仍然保持重要經濟中心地位（其內涵已經變化），但在需要明確城市性質中的經濟職能時卻顯得不夠自信，出現了爭議。

近30年工業發展培育了「重要的經濟中心」職能

只有當經濟總量增長到一定程度，人均國民收入顯著增加，使消費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才會導致產業結構（它決定著供給結構）相應發生變化。改革開放後，北京經濟內涵的變化就是在解放後經濟發展和積累的基礎上發生的。近30年的工業發展培育了北京在全國的重要經濟中心地位。

經濟發展過程具有客觀階段性，不同的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產業結構特徵，前一階段的產業發展是以後結構升級的基礎。隨著城市及其所在區域的經濟發展，城市產業發展的重點必然從資源、資本密集型工業向資本、「知本」密集型工業、從工業向服務業轉移和升級。根據發達國家經驗，當經濟總量增長達到幾個特殊值域時，產業結構的變動往往具有顯著特徵。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在1,000美元以下時，第一產業比重逐漸下降，第二產業比重迅速上升，第三產業比重緩慢上升。人均GNP超過1,000美元時，第二產業比重開始下降，第三產業比重迅速上升。日本在二戰後就經歷了從經濟恢復和產業發展時期（1940年代中期至1950年代末），到重工業化引導下的產業高速增長期（1960年代），再到以知識密集型產業和節能型高技術產業為導向的產業結構調整期（1970年代），

從而為目前的創新型知識密集型產業結構打下基礎。北京存在著類似的發展過程。如前所述，北京在經歷了經濟恢復和產業發展期後，以重工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較快。直到1994年人均GNP突破1,000美元，重工業化發展才開始進入低潮階段（如圖2），產業結構進入了以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新階段。在新中國成立後的30年裏，北京地方財政收入的92%來自工業（北京市統計局, 1999），尤其是重工業。沒有近30年的重工業化發展和相應的財政積累，以及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各種國內、國外經濟聯繫，也許就不會有其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的迅速發展，以及在國內外經濟聯繫中紐帶功能的增強。可以說，正是近30年的工業發展充實了北京在經濟中心三個層面上的內涵，而出現工業發展與城市功能矛盾的根源亦在於城市功能布局的不合理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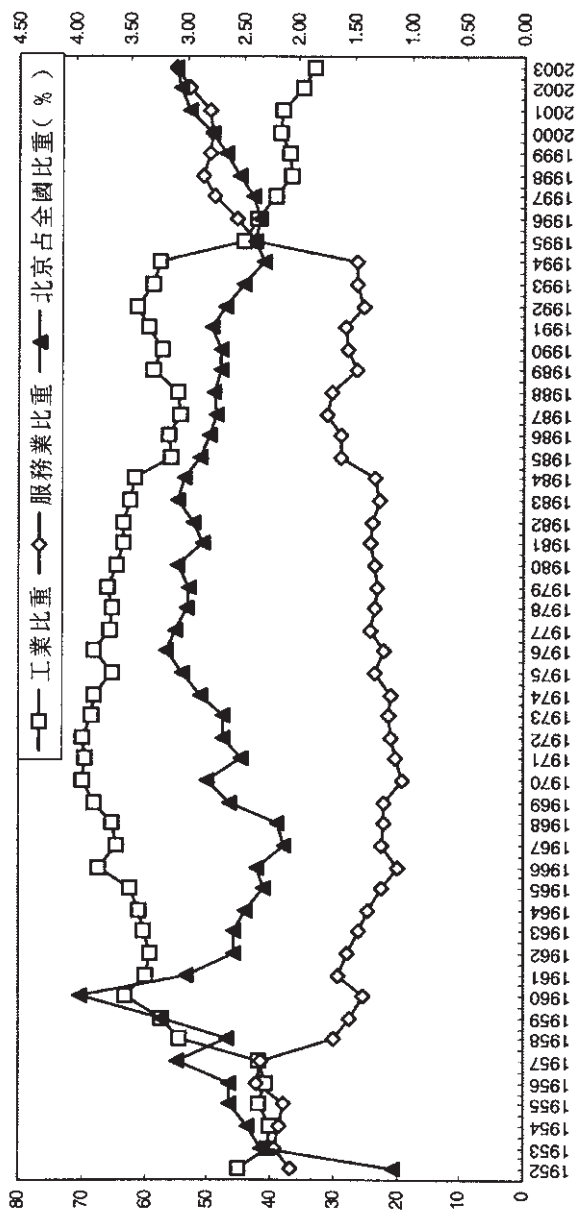
以高端經濟為基本內涵的 重要經濟中心職能已是一個現實

如前所述，經濟中心不但要具有相當的經濟規模，在區域產業鏈條中居於高端位置，而且必須擁有對區域經濟的組織功能和一定的對世界經濟的控制和影響力。北京在這三方面有著顯著表現。

從佔全國比重看，北京現在仍是重要的經濟中心

自1953年版總體規劃實施以來，隨著傾向重工業的投資政策的實施，北京在區域乃至全國中的經濟中心職能不斷強化。即使在1983年版總體規劃取消經濟職能的表述之後，其經濟中心職能依然在發展慣性和客觀規律的軌道上前進。在全國經濟普遍增長的背景下，北京佔全國經濟總量的比重在1976至1983年達到高峰（除「大躍進」時期外），達3.09%，成為除了上海之外中國的另一個重要經濟中心。這是北京多年發展

圖2：北京工業、服務業發展演替與北京經濟地位變化關係，1952-2003



資料來源：北京工業產值、服務業產值、社會總產值和本地生產總值（GDP）數據：1952至1998年根據北京市統計局（1999），1999至2003年根據北京市統計局（2000-2004）；全國GDP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2004a, 2004b）。

工業累積的結果。此後，這個比重隨著北京調整經濟發展思路所引發的工業比重的降低而一路走低，1994年到達最低點，僅佔全國的2.32%。經過產業結構調整，服務業逐步取代工業成為北京經濟發展的支柱，³尤其在1995年，服務經濟的增長有效地抵消了由於工業經濟弱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抑制住北京在全國中經濟地位的繼續下降。此後隨著服務經濟的增強，北京的經濟地位不但重新逐步得到鞏固，而且在2003年佔全國經濟總量達3.10%，超過了作為中國工業經濟中心時曾達到的經濟地位（如圖2）。2003年北京按經濟總量居全國所有城市第二，其本地生產總值（GDP）（3,612億元）為居第一位的上海（6,251億元）的一半強（北京市統計局，2004；上海市統計局，2004），高於第三位的廣州（3,467億元）（廣州市統計局，2004）。因此，北京因為工業的發展曾經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在服務業支撐下，北京同樣也是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可見1994年後隨著北京產業發展階段的自然更替和政府的有意識調控，北京的經濟中心地位又逐步得到鞏固和提升，這是通過更新經濟中心的基本層次的內涵而獲得的，即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和工業的成功升級。

從全國產業鏈看，北京居於高端位置

北京的重要經濟中心地位還突出體現在其領先於全國的高端經濟。在完成城市工業資本積累之後，隨著全國經濟基礎的提升和新國際勞動分工格局的形成，北京經濟中心基本層次的內涵由工業經濟向高端經濟變化，成為具有全國意義的創新生產地和市場地、生產者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聚集地。北京居於全國產業鏈的高端位置，奠定了其帶領輻射區域共同發展成為世界城市的基礎。

首先，北京是全國科技創新最主要的生產地和市場地。北京的科研水平和成果數量居全國領先地位，某些方面與世界城

市的水平相距並不遠（沈金箴, 2003），如在被國外主要檢索工具收錄的論文數方面。同時，北京正成為跨國公司在中國最重要的研發基地。據統計，到2002年8月底，至少有65家跨國公司在華設立了82家研發機構，其中北京49家、上海15家、深圳5家（中國科技統計, 2003）。這些研發機構多是跨國公司為其在中國和亞洲的生產進行新產品開發服務。同時，北京正成為全國科技創新最主要的市場地。2003年，全市成交技術合同32,173項，成交總額265.4億元，佔全國成交總額的24.5%（北京技術市場管理辦公室, 2003）。並且，北京與國內其他省市的技術交易以輸出為主，對上海的輸出最為突出，對香港等地的輸出增長迅速（如表1）。可見由北京豐富的科技人才資源所創造的創新產品，正日益轉化為全國的生產力。

其次，北京正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生產者服務業中心。服務業是構成北京經濟中心基本層次內涵的重要內容，以服務業

表1：北京向國內其他省市輸出和吸納科技成果情況比較，2003

流向	總量 (項)	成交額 (億元)	主要流向	重要特點
輸出	15837	132.40	大多流向沿海和經濟較發達地區	成交額超過4億元的有上海、廣東、山東等11個省市。其中上海吸納技術1173項，成交額21.26億元，居全國之首。流向香港增長非常顯著，2003年比2002年增長了14倍。
吸納	5415	36.03	來自與北京科技互補性較強的地區	吸納技術成交額超過1億元的有11個省市，主要為遼寧、陝西、湖北等省市。近4年累計成交額超過5億元的有7個省市，主要為遼寧、江蘇、天津等省市。

資料來源：北京技術市場管理辦公室（2003）。

為主的產業結構在全國具有領跑優勢。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服務業產值自1996年首次超過工業，就一直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2003年服務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7.3%。2003年北京三次產業結構為2.6：36.0：61.4，大大領先於全國水平（14.8：52.9：32.3），也領先於上海（1.5：50.1：48.4）、廣州（3.0：43.4：53.6）、天津（3.7：50.8：45.5）等國內其他城市（國家統計局，2003）。更為重要的是，北京的服務業服務全國，尤其是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社會服務、房地產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金融和保險業等生產者服務業，這些行業在全國範圍內的區位商（location quotient）近十年來顯著提高，⁴絕大多數的區位商增長都在兩倍左右（如表2）。這表明生產者服務業作為現代產業鏈條中的高端產業，無疑正成為北京城市基本經濟活動的核心，也表明北京在全國產業鏈條中的高端位置正不斷鞏固和提升。批發、零售貿易和餐飲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區位商的下降則主要是由於北京工業品輸出的減少而造成的，這從另一角度表明北京的服務業正日趨高端化和核心化。由於生產者服務業只集中在少數的經濟中心城市，上述發展趨勢正凸顯了北京作為中國重要經濟中心的特徵。

最後，高新技術產業正成為北京工業的主要增長源，並在全國具有重要地位。高新技術產業規避本地水資源及礦產資源相對稀缺的劣勢，充分利用首都知識資源相對豐裕的優勢，獲得蓬勃發展。1992年北京高新技術產業產值為66.4億元，佔全市工業總產值（878億元）7.6%，2002年1,175.9億元，佔工業總產值（3,173.5億元）37.1%（北京市統計局，2002），十年所佔份額增長了約30%。高新技術產業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率最近三年一直保持在60%左右（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2001）。這些高新技術產業的區位商達2.07（周一星等，2004），具有顯著的區域及全國意義。與首都信息中心角色密切相關的電子計

算機及辦公通訊、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等行業的區位商最為突出，微機、數字廣播發射機、全固態電視發射機、電力電子功率器等高端產品佔有全國大部分市場，對拉動其他地方的產業發展，提高生產效率起著重要作用。同時，北京這種高新技術帶動製造業與城市功能協調發展的模式具有先進性，對全國其他城市有強烈的示範效應。

從全國經濟的運行看，北京是組織中心

全國經濟發展的組織中心構成了北京作為中國重要經濟中心的核心涵義。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集中了所有決定和影響國內經濟發展的決策機構。它們通過制定經濟政策和人事安排，直接或間接地對國內經濟起著組織作用。直接對經濟起組織作用的國家部委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財政部等。作為國家金融命脈，建設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總部都在北

表2：北京市服務業區位商變化，1990-2001

行業	1990	1994	2001	發展趨勢
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	13.63	13.66	26.22	上升
社會服務、房地產業	5.13	7.98	12.20	上升
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	2.29	2.77	4.99	上升
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	2.51	2.67	4.51	上升
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	2.92	3.21	3.99	上升
金融和保險業	1.67	2.01	3.89	上升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	2.25	1.37	1.54	下降
批發、零售貿易和餐飲業	2.25	1.79	1.54	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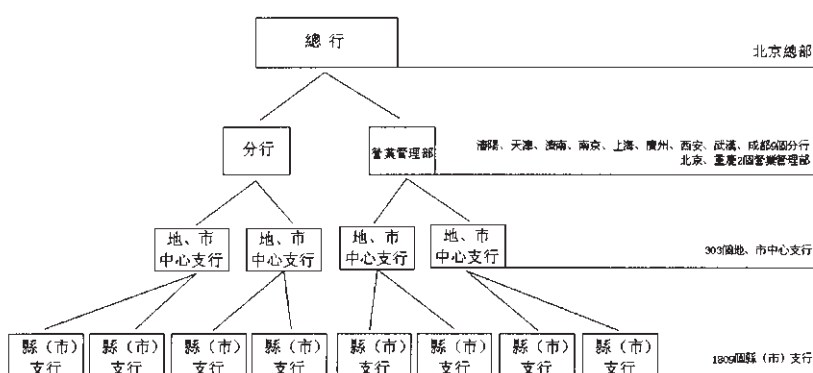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根據北京市統計局（1999）及（2000-2004）之2002年數據計算。

京，全國超過80%的金融機構的業務總部和研發中心也聚集在北京。政策、人事、金融的結合，使北京成為全國經濟發展的組織中心。中國人民銀行的職能和組織架構體現了北京的這種功能。作為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主要承擔著（一）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二）監督管理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三）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金融穩定；（四）確定人民幣匯率政策，維護合理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實施外匯管理，持有、管理和經營國家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五）發行人民幣，管理人民幣流通；（六）經理國庫等職能（中國人民銀行, 2004）。它的職能行使過程就是中央政府組織全國經濟的過程（如圖3），也就是北京發揮全國經濟組織中心的作用的過程。

從與世界經濟的聯繫看，北京已具較大的影響力

在全球化過程中，北京作為中國的重要經濟中心，還應在

圖3：中國人民銀行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4）繪製。

世界經濟格局中擁有相當的地位。我們可以根據跨國機構的活動情況（包括在該市的跨國公司區域性總部或代表處數量、外資銀行分行或代表處數量、跨國研發機構數量及服務範圍），以及北京企業主動參與世界經濟循環的情況（包括研發機構在世界經濟鏈條中的地位 and 所擁有的本國進出口額最大的企業數量）兩組指標，考察北京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高度、廣度和深度。

目前在北京跨國公司區域性總部達25家，多數是管理和協調中國大陸甚至大中華經濟圈的業務。包括IBM、摩托羅拉等著名公司。儘管數量上不及上海（76家），但北京還有外國公司駐京代表處近8,000家，絕大多數是作為駐華的代表機構，數量在全國首屈一指。北京直到1995年才被批准可以引進營業性外資金融機構，晚了上海五年。但2002年在北京設立分行的外資銀行已達19家，佔全國13%，僅次於上海（40家），代表處82家，佔全國39%，遠高於上海（64家）（中國金融學會，2003）。隨著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這些跨國銀行的駐京代表機構將逐步升格為分行。目前，跨國公司在北京設立的研發機構已達49家以上，為跨國公司在全球的生產提供最新的技術。如目前全球40%的諾基亞手機是在北京進行研發的。微軟在北京研發機構的發展歷程，則更能體現北京對亞洲甚至全球經濟鏈條的拉動作用。1998年微軟中國研究院在北京成立，2001年更名為微軟亞洲研究院，2003年微軟亞洲工程院也在北京成立；同時，研究院自1998年以來已申請國際專利逾百項，多項技術被成功轉移到微軟公司的產品當中（如Windows XP、下一代操作系統Longhorn等），從而對世界的經濟技術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表明北京在全世界計算機科技方面的影響和引領作用，在地域上已從中國向亞洲地區乃至全球擴展，在產業鏈條上已從基礎研究向工程技術乃至相關產品延伸。

同時，北京市內的科研機構開始參與全球部分產業標準的制定，如大唐電信是全球三大第三代移動通信標準之一TD-

SCDMA標準的制定者，該標準是中國第一個參與制定的國際通信技術標準，對未來全球通信業發展將產生重要影響。中國進出口額最大的500家企業是中國與世界市場聯繫最密切的企業，也是最有前途變成跨國公司的企業，其中在北京73家，遠超出上海（44家）和廣州（41家）（周一星, 2000），表明北京在代表中國參與世界經濟循環方面更有影響力。

重要經濟中心的職能將得到鞏固和提升

城市性質是對城市未來主要職能的一種趨勢判斷。過去、現在是經濟中心的城市未來不一定還能夠保持其地位，因此還必須考察城市未來發展的態勢。

強化首都經濟中心職能是必然趨勢

國際經驗表明，首都的城市職能趨於綜合。一方面，城市功能疊加性發展規律和作為國家政治、文化中心所帶來的功能倍增效應，使首都城市的功能發展不可避免地走向綜合。從單一到多元、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是一個城市必然的功能發展過程。原來沒有的功能產生並發展起來，已有的功能則在繼承下來的同時得到進一步完善，這使得現代城市成為多元功能的集合體。城市新舊功能的疊加，不僅推動城市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同時使城市諸功能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以整體非加和性的特點產生倍增效應，極大地增強城市功能的能量。就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功能的關係看，在知識經濟時代，由政治中心功能衍生出來的文化和科技中心功能，使城市獲得發展知識經濟的競爭優勢，增強了經濟中心功能，而經濟中心功能的強化又進一步增強了城市的凝聚力，鞏固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東京（沈金箴, 2003）、倫敦、首爾都經歷了類似的功能演進過程，成為當今功能綜合的世界城市。另一方面，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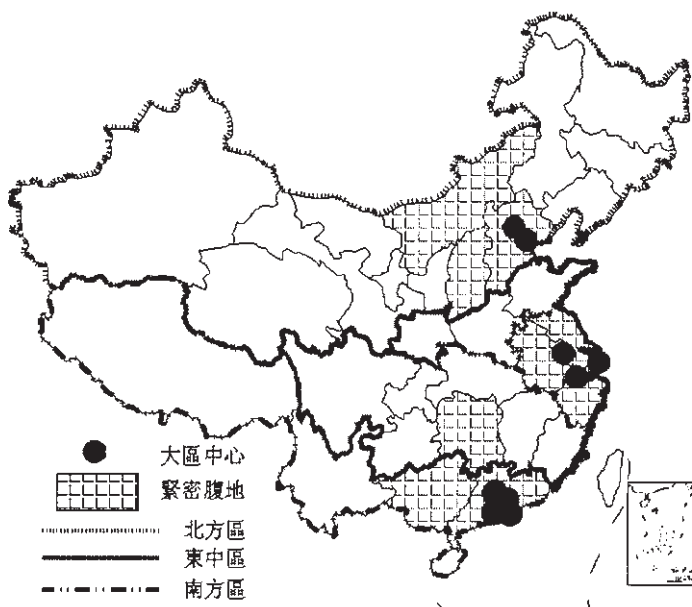
為純粹國家政治首都的城市由於其發展前景受到挑戰，正在轉型。如華盛頓正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研發及生產，以提高經濟功能，擺脫單一政治中心功能所帶來的城市競爭力不強的影響。

北京強化經濟中心職能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伴隨世界和中國經濟增長而來的整體產業結構升級，使經濟中心的基本層次內涵已轉變為以創新為核心，服務業（尤其是生產者服務業）為主體，高新技術產業為基礎的高端經濟。北京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組合，經濟中心地位的歷史承繼，以及作為發展中大國首都參與全球化的城市間功能地位的激烈競爭，都必然促使北京的城市職能進一步走向綜合。如果說在新中國初期，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經濟中心職能與政治、文化中心職能存在矛盾的話，那麼現在由於經濟中心基本層次內涵被賦予了新的內容，這三種職能的結合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融洽和緊密。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三合一」的功能特點將要求北京在中國乃至世界經濟鏈條中不斷上升並持續佔據高端位置，趨向成為高端化的經濟中心和世界城市。因此，北京的重要經濟中心職能將得到進一步強化和昇華。

發展北京重要經濟中心職能是完善中國經濟版圖結構的需要

從中國經濟的版圖結構看，中國不可能只有一個經濟中心，需要北京成為重要的經濟中心。據周一星和張莉（2003）的研究，根據核心區與腹地之間的聯繫強度，可以把中國劃分為以京—津、滬—寧—杭、港—澳—粵—深為中心城市的三個一級城市經濟區，也就是北方區、東中區和南方區。其中，北方區以京津唐為主要聯繫方向，主要通過京廣、京滬、京哈、京包—包蘭—蘭新等交通幹綫網組織區內經濟活動，吸引的腹地包括中國秦嶺—淮河—綫以北的幾乎所有省區。北方區雖與東中區、南方區存在著競爭腹地，但基本上是一個有特色的獨

圖4：中國一級城市經濟區劃分



資料來源：周一星、張莉（2003）。

立經濟區（如圖4）。目前，中國其他主要城市都把發展成為中國乃至國際的重要經濟中心作為其城市性質的要件。如香港規劃署編制的《香港2030》明確香港是：中國主要城市，亞洲首要國際都會，享有類似紐約和倫敦同樣的地位（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署，2005）。《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9-2020）確定上海是「我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和航運中心，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並將逐步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之一」（上海市城市規劃管理局，2005）。從完善中國經濟的版圖結構看，中國北方需要一個經濟中心乃至世界城市，以驅動北方區和中國加速進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

程。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和北方區的核心城市之一，最有條件發展成為帶動本區域（乃至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鞏固和提升重要經濟中心職能尚有很大潛力

與世界城市相比，北京目前在經濟中心的三層內涵上呈現出「橄欖形」結構，即第一層較弱，第二層最強，第三層較弱。具體表現為，經濟規模較小，高端經濟優勢尚未充分發揮，與世界經濟聯繫還不夠緊密。作為中國經濟組織中心的功能雖然最強，但其組織全國經濟的能力也還有待進一步提高。然而，北京強化重要經濟中心職能尚有很大潛力。

首先，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已發生質變式的提升。推動北京經濟增長的第一要素已由資本轉變為制度和技術創新。分析1989年以來資本、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對北京經濟增長的貢獻（如表3），⁵可以看出，以1997年為界，以制度和技術創新為核心的全要素生產率對北

表3：促進北京經濟增長的因素分析，1989-2002（%）

項目	1989-1997		1997-2002	
	增長率	貢獻度	增長率	貢獻度
GDP	10.39	100.00	10.52	100.00
要素貢獻	10.36	99.71	5.20	49.43
其中：資本	9.55	91.92	4.74	45.06
勞動	0.81	7.80	0.46	4.37
全要素生產率	0.03	0.29	5.32	50.57

注：本表中資本、勞動力彈性值根據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關於開展經濟增長中科技進步作用測算工作的通知》（計科技[1992]2525號文）分別取0.35和0.65，勞動增長率採用從業人口增長率，資本增長率採用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

資料來源：根據北京市統計局（2000-2004）之2003年計算。

京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已超過資本、勞動投入，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北京經濟已經初步從依賴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長過渡到依賴制度創新、技術進步的內涵式增長，經濟發展的後勁顯著增強，各類產業將繼續在以創新為靈魂的高端經濟道路上進一步發展，重要經濟中心的實力將進一步壯大。

其次，發展高端經濟和組織國家經濟獨具優勢。北京的智力和科技資源使其有條件建成中國首要的科技創新輻射源。

「三流的企業賣產品、二流的企業賣技術、一流的企業賣專利、超一流的企業賣標準」，研究、設計等高端環節屬於得到專利、標準的環節，這也正是北京的優勢所在。只要北京集中力量進行研發，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就能以居於全國產業鏈的高端優勢，與國內其他城市合作，實現研究—成果—產業化—利潤—再研究的良性循環，加快北京的科技成果轉化為全國的現實生產力，鞏固和提升北京在國內產業鏈條中的上游地位，引領國內其他地區發展。北京承擔著以「四個服務」（為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高效開展工作服務、為國際交往服務、為科技教育發展服務和為改善人民群眾生活服務）為中心大力發展相關服務業的重要職責。「四個服務」的要求體現了北京服務業的高端本質，也為北京發展服務業提供了來自中央及地方的政策和財政支持。同時，北京的發展態勢和國際經驗表明北京有條件，⁶也必須發展為中央政府中樞管理功能服務和其他與此功能相協調的高新技術產業，這將保持和提升北京在京津冀地區製造業鏈條中的高端位置，引導區域經濟發展。通過制度創新，日益開放的中國政府其經濟決策和管理水平明顯提高，包括金融衍生品等在內的新型市場經濟調控工具不斷產生，政府決策的透明化則使上政下達、下情上達更為便捷，因此，北京在加快國家制度創新，有效調控國內經濟發展方面，將能夠更加充分地發揮其經濟組織中心的作用。

最後，經濟迅速發展中的北京和中國將支撐北京成為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主要節點。作為首都，北京是國內信息集散和中

國同世界信息交流的樞紐，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外資進入中國和國內資本走向全球的重要門戶。同時，北京的科研實力和中國巨大的市場相結合，將使北京在參與全球產業標準的制定和新技術的研發上，發揮越來越明顯的重要作用，進而提高其在全球產業鏈條中的地位。因此，隨著自身經濟和中國經濟的壯大，北京對世界經濟的控制力將明顯增強，將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越來越重要的節點。這可以從跨國公司的預期得到驗證。據2002年《財富》雜誌的一項調查顯示，92%以上的跨國公司若干年內將考慮在中國設立區域性總部，其中15%的跨國公司首選北京。預計到2020年，北京將會有超過100家跨國公司區域性總部，外資銀行超過50家。屆時，北京在世界經濟控制力方面將接近區域性國際城市（周一星等, 2004）。

重要經濟中心職能的內涵可以進一步明確

「聯合型經濟中心」應是北京重要經濟中心職能的地域內涵。未來北京的城市功能必然走向綜合性。增強經濟中心職能的途徑有兩條：一是立足於北京自身的綜合發展；二是通過區域功能整合，尤其是京、津的協作，加強製造業基礎和拓展城市發展空間。作為未來世界城市的北京，也必然是通過發展以京、津為核心的都市連綿區參與全球競爭。因此，京、津的地緣關係、經濟互補性都決定了未來這個經濟中心的地域應包括京、津兩地，形成以京、津為核心並有明確分工的「聯合型經濟中心」。《京津冀北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的完成，已使京津冀地區的協作引起有關各方的進一步重視。據筆者瞭解，京、津兩地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的優勢整合已提上了議事日程。因此，如果北京在城市性質中能夠以「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為目標，無疑將為今後本地區的優勢整合做好進一步的理論和輿論準備。

北京經濟中心職能包含三個梯度層次的涵義，即以三個層次的職能，帶動不同梯度範圍的地域。一是以中國北方為主要腹地的區域經濟中心：在中國北方乃至全國產業鏈條中佔據高端位置，帶動區域經濟發展。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組織中心：以宏觀調控的決策中心、管理中心的角色組織與指揮國內經濟發展，具有全國意義，這是內地其他城市所不具備的功能。三是全球經濟體系的主要節點：是中國聯結全球經濟體系的主要通道，全球經濟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與其他世界城市一起共同驅動全球經濟向前發展。

結語

根據以上分析，北京作為重要經濟中心，其基本層次的內涵已經脫胎換骨，形成雙核心的「聯合型經濟中心」是必然選擇，三個層次的職能梯度是重要經濟中心的完整涵義。北京過去、現在及未來都是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作為中國北方的經濟中心是基本層次的涵義，同時有必要明確更高梯度層次的涵義。因此，筆者建議，不僅應在北京城市性質中增加「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的職能表述，更要明確其三層次的完整涵義，三層次是指區域經濟中心、全國經濟發展的組織中心，以及全球經濟體系的主要節點。

注釋

1. 另三個是：國家首都、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2. 比較國際學術界對世界城市的定義，可以發現，除了Friedmann（1986）基於1980年代的世界生產力發展階段提出的世界城市是「重要的生產製造業中心」之外，Hall（1982, 1998）、Sassen（1991）和Short等（1996）都認為世界城市更重要的是一個世界經濟的組織和管理中心，尤

其是Sassen認為，世界城市生產的是一種引導經濟發展的「組織產品」(organizational commodity)。

3. 第三產業是憑藉一定的物質技術設備，為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服務的各種行業的總稱，因此第三產業可視為服務業。
4. 區位商大於1的部門是具有基本活動部分的部門。基本活動部分是指為外地服務的那一部分城市經濟活動，是導致城市發展的主要動力。
5. 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經濟增長的來源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生產要素投入，如勞動、資本、土地、能源或其他資源；二是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是由制度性和技術性所構成。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根據「全要素生產率」得出這樣的結論：經濟的高增長必然伴隨著生產率的提高，否則這樣的經濟是難以持續的。因此全要素生產率成為衡量一個區域或城市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的重要標誌。
6. 為增強倫敦經濟體系的安全性，倫敦發展戰略提出：「要想在未來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平衡發展、減少對服務業的依賴，建立廣泛而強大的經濟基礎至關重要」。可見，保持一定的製造業比例有助於增強首都城市抵禦經濟風險的能力。

參考書目

上海市城市規劃管理局。2005。「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http://www.china-up.com/project/showproject.asp?id=136>)，11月15日登入。

上海市統計局。2004。「2003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統計公報」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dfndtjgb/t20040206_139408.htm)，1月20日登入。

中國人民銀行。2004。「職能」 (<http://www.pbc.gov.cn/renhangjianjie/zhineng.asp>)。

中國金融學會編。2003。《中國金融年鑒：2003》。北京：中國金融年鑒出版社。

中國科技統計。2003。「跨國公司在華設立R&D機構的特點與趨勢」 (<http://www.sts.org.cn/tjbg/other/documents/2003/0301.htm>)。

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編。2001。《2001北京市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年度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

北京市規劃委員會。2003。《北京城市空間發展戰略研究》。北京：北京市規劃委員會。

北京市統計局編。1999。《北京五十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北京市統計局。2000-2004。《北京統計年鑒》1999-2003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北京市統計局。2002。「2002年高新技術產業情況」 (<http://www.bjstats.gov.cn/xxcx/ndxl/ndxl-203.htm>)。

北京技術市場管理辦公室。2003。「2003年北京技術市場統計公報」 (<http://www.cbtm.net.cn/jytj/2003tjgb.htm>)。

沈金箴。2003。「東京世界城市的形成發展及其對北京的啓示」，《經濟地理》，第23卷，第4期，頁571-76。

沈金箴、周一星。2003。「世界城市的涵義及其對中國城市發展的啓示」，《城市問題》，第3期，頁13-16。

周一星。1996。「北京的城市性質和經濟職能」，《國土和區域經濟》，第4期，頁38-41。

周一星。1999。《城市地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周一星。2000。「新世紀中國國際城市的展望」，《管理世界》，第3期，頁18-25。

周一星、張莉。2003。「改革開放條件下的中國城市經濟區」，《地理學報》，第58卷，第2期，頁271-84。

周一星、陳彥光等。2003。《城市與城市地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周一星等。2004。《北京城市職能、發展目標及總體發展策略研究》。北京：北京市規劃委員會。

胡兆量主編。1999。《中國區域發展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署。2005。「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http://www.info.gov.hk/hk2030/hk2030content/home_ch/2030_c.htm），11月15日登入。

國家統計局。2003。「地方年度統計公報」（<http://www.stats.gov.cn/tjgb/>）。

國家統計局。2004a。《中國統計年鑒200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國家統計局。2004b。「中華人民共和國200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40226_402131958.htm）。

楊開忠。1997。「北京經濟基礎的主要特點和趨勢」，《地理學報》，第52卷，第6期，頁481-90。

趙京興。1996。「北京的城市功能與首都經濟的基本特點」，《北京規劃建設》，第5期，頁15-20。

廣州市統計局。2004。「地區生產總值：2003年」（<http://www.gzstats.gov.cn/Admin/sjcx/nds/2004/01.htm>）。

羅哲文。2004。「北京市的城市性質應改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並論歷史名城保護、建設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卷，第1期，頁8-14。

顧朝林等。1999。《中國城市地理》。北京：商務印書館。

Friedmann, John.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1):69-83.

Hall, Peter.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譯)。1982。《世界大城市》。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Hall, Peter. 1998.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Cities," in Fu-chen Lo and Yue-man Yeung (eds.),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of Large Cities*. Tokyo: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pp. 17-36.

Sassen, Saskia.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ort, J. R, Y. Kim, M. Kuus and H. Wells. 1996. "The Dirty Little Secret of World Cities Research: Data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4):697-717.

「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應成為 北京城市性質的要件

摘要

經濟中心是否應成為北京城市性質中的要件，在管理層和學術界一直存在分歧。對北京中國重要經濟中心職能的形成、產生爭議的根本原因，以及現狀的基礎和未來的發展趨勢進行研究，將有助於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科學修編。本文認為，北京的經濟中心職能自1949年以來得到不斷培育，其基本內涵已由原來的工業經濟轉變為高端經濟。北京、天津經濟職能整合形成雙核心，「聯合型經濟中心」是其基本形態。目前及未來將鞏固和發展三個梯度層次的職能：基本層的中國北方的經濟中心，核心層的中國經濟發展的組織中心，發展層的全球經濟體系的主要節點。由於信息、人才等優勢，北京將保持和增強其作為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的地位。因此應將「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作為北京城市性質的要件之一，引導其長遠發展。

China's Important Economic Centre

One of the Dominant Functions of Beijing

SHEN Jinzhen

Abstract

Whether or not Beijing should be accepted as an important economic centre in China has been at the heart of heated discussions over revisions of master plans for Beijing since 1949. Based o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these plan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the prospects for Beijing's econom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Beijing was and is an important economic centre in China, and will remain so as the Chinese economy progresses. Three levels of discourse on the role of Beijing as an important economic centre in China will also be illuminated.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Yeung Yue-man, PhD(*Chic.*),
Research Professor

Associate Director: Sung Yun-wing, PhD(*Min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